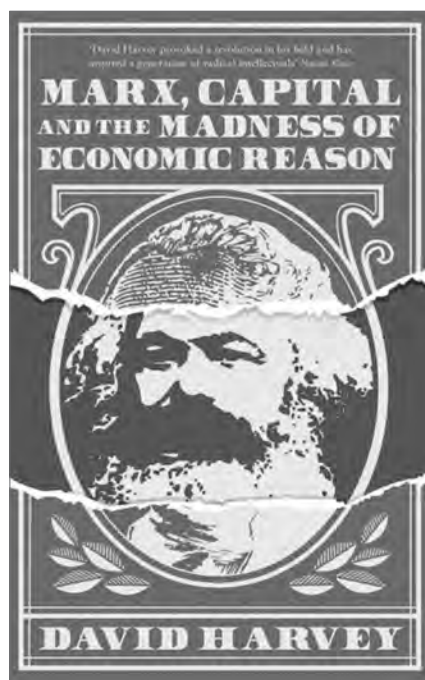


剩餘價值論與後就業社會

——評 David Harvey, *Marx,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*

• 鄒崇銘

相對於「資本」和「空間」等概念，「階級」和「勞動」並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的核心命題。2017年哈維的新作《馬克思、資本和經濟理性的瘋狂》即為勞動價值理論的空白作出了重要補充。



David Harvey, *Marx,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* (London: Profile Books Ltd., 2017).

眾所周知，剩餘價值論乃是馬克思階級分析的核心，而階級分析則是其唯物史觀的核心。但在過去數十年，發達國家或地區已全面從

工業社會邁向後工業社會，製造業全面讓位於服務行業，服務行業復又深受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衝擊。隨着人工智能和機械人的逐漸普及，人類正迅速邁向或可稱之為「後就業社會」(post-employment society) 的新時代。工人階級業已被分化得支離破碎，勞動過程被拆解至七零八落，剩餘價值論亦早已顯得「過時」。

在《流動、掠奪與抗爭：大衛·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》一書中，筆者曾經大膽地指出，相對於「資本」和「空間」等概念，「階級」和「勞動」並非馬克思主義地理學家哈維 (David Harvey) 的核心命題^①。例如關於城市階級政治的詳細討論，便只能在哈維早期著作如《都市經驗》(*The Urban Experience*) 中找到^②。言猶在耳，2017年哈維的新作《馬克思、資本和經濟理性的瘋狂》(*Marx, Capital and the Madness of Economic Reason*，引用只註頁碼) 即為勞動價值理論的空白作出了重要補充。

哈維已屆八十二歲高齡，但仍維持每兩三年便出版一部新書，應該算是學術界罕見的例子。但當筆者滿以為這是一本「舊酒新瓶」之作時，竟想不到它和以往多本資本累積的「通論」有別，此乃是哈維關於勞動過程和勞動價值生產的「專論」，當中更不乏嶄新的學術見解，對洞察後就業社會的前景至關重要。本文先簡介哈維前作的「通論」，並以此為基礎評析新作「專論」的特殊意義，嘗試比較全面剖析哈維對當代資本主義矛盾的思考。

一 資本過度累積與時空修補

資本主義如何進行「時空修補」(spatial-temporal fix)，力圖推延(但無法解決)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，乃是貫串哈維所有著作的主要命題。自從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伊始，資本皆致力衝破時空的阻隔，並且不斷創造駕馭時空的新秩序。顯而易見，這和資本開拓新的投資機會和市場渠道，藉以維持資本的不斷擴大累積息息相關。此點亦正好充分說明，為何馬克思主義和地理學的關係如此緊密，以及哈維的卓越學術貢獻所在。

對此哈維採用了一個「資本的三級循環路徑」(three circuits of capital)的分析框架，並罕有地以圖像方式展示出來(圖1)，曾見諸《資本的限制》(*The Limits to Capital*)、《新帝國主義》(*The New Imperialism*)^②以及上述2017年的新作(頁151)。其中初級循環是資本家生產的商品，通過市場流通和

消費，完成直接的資本累積過程；次級循環主要指資本被投放到建造環境(built environment)的生產性(如基建運輸)和消費性(如房地產)投資，資本累積是一個漫長和不確定的過程；三級循環則指同樣長期的社會投資，亦可分為生產性(如科學研究)和消費性(如社會福利)兩方面，資本累積同樣漫長和不確定。

簡略而言，哈維作為一位地理學家，其主要關注焦點乃在於次級循環，即資本如何通過擴大建造環境的投資(即空間修補，spatial fix)，力圖推延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(即時間修補，temporal fix)。如2008年金融危機後，中國政府大力投資高速鐵路和高速公路，如今又再將資本輸出到「一帶一路」沿線國家，建造環境的投資為其主要推

資本主義如何進行「時空修補」，力圖推延(但無法解決)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，乃是貫串哈維所有著作的主要命題。自從資本主義萌芽的時代伊始，資本皆致力衝破時空的阻隔，並且不斷創造駕馭時空的新秩序。

圖1 資本的三級循環路徑



資料來源：鄒崇銘：《流動、掠奪與抗爭：大衛·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》(台北：南方家園，2015)，頁68。

後工業城市普遍面對的發展困境，構成了貫串哈維著作的主要研究案例。他的「彈性累積」概念最廣為人熟悉。他關注到資本正擺脫傳統製造業和大規模生產的束縛，轉向更靈活和多元的方式來進行累積。

行手段。“Fix”一詞除了指對資本主義危機進行「修補」外，亦隱含將生產資料黏合和凝固在特定時空，以滿足生產和累積需要的意義。

然而問題亦正正在於，建造環境的投資不但有賴極龐大的資本投入，同時亦必定涉及土地空間的規劃，兩者皆絕非市場機制能有效解決，難免涉及國家的高度參與。基建運輸和房地產，一方面成為地方政府吸引外來資本的重要工具，另一方面卻構成沉重的社會、環境及經濟成本。但如下文所述，最終天文數字的基建投資被「凝固」了，構成地方上沉重的財政負擔，卻並不必然帶來長遠的生產性活動和盈利，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只是被推延而沒有得到解決。

二 時空壓縮與彈性累積

哈維在1969年從英國移居美國巴爾的摩(Baltimore)，任教於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(Johns Hopkins University)，親身經歷了這個美國鋼鐵之都衰敗的命運。隨着重工業的遷離，巴爾的摩經濟不斷走下坡，直至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仍然無法復原。無論當地政府如何大力投資遊輪碼頭、會展中心和主題公園等，通過基建投資試圖為地方經濟注入新動力，終皆無法挽回市民和投資者的信心。後工業城市普遍面對的發展困境，構成了貫串哈維著作的主要研究案例。

哈維在1989年出版的《後現代的狀況：對文化變遷之緣起的探究》(*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: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*

Cultural Change)中提出了「彈性累積」(flexible accumulation)的概念，可說是他最廣為人熟悉的著作和理論^④。他在書中提及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化，例如製造業不斷向發展中國家遷移，工人階級面對就業彈性化等現象；但他更關注到，資本正擺脫傳統製造業和大規模生產的束縛，轉向更靈活和多元的方式來進行累積。

書中提出的核心命題在於：隨着基建運輸及通訊技術的進步，空間的阻隔不斷被征服，跨越空間所需的時間被大大縮短，遂帶來「時空壓縮」(time-space compression)的社會生活體驗，為「後現代的狀況」提供了物質基礎。由此在當代城市規劃、建築、電影和廣告等廣泛領域，均能普遍找到可統稱為「後現代文化」的現象，盡皆涉及後工業社會、後福特主義(Post-Fordism)的生產模式，為資本累積提供靈活及多元化的嶄新可能，與工業社會、福特主義(Fordism)的現代文明形成強烈對比。

哈維在2002年發表的〈租值的藝術：文化的全球化、壟斷和商品化〉(“The Art of Rent: Globalization,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”)一文，為彈性累積提供了重要的微觀經濟理論基礎^⑤。他在文章中指出在製造業式微的後工業城市，文化產業和城市空間成為主要的累積工具，為相關服務行業帶來重要收入來源。本土文化作為一種「集體象徵資本」(collective symbolic capital)，被資本家「圈定」(enclose)為賺錢的商品。旅遊業、航空業、酒店業、娛樂、飲食及零售業獲得巨大收益，正是成功挪用

獨一無二的本土文化，攫取可觀的「壟斷租值」(monopoly rent)。

三 新帝國主義與掠奪性累積

然而，在2002年之後的著作中，哈維已鮮有採用「彈性累積」這個概念。因應「9.11」事件和第二次波斯灣戰爭的爆發，2003年，他撰寫了《新帝國主義》一書，主要指向布殊(George W. Bush)政府採取赤裸裸的高壓手段，以維持美國衰落中的政治經濟影響力。哈維在書中提出了「掠奪性累積」(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)的嶄新概念，成為近十多年貫串其著作的核心命題。

書中首先論及美國作為全球霸主，經歷了四個主要歷史發展階段：一、資產階級帝國主義(1870-1945)：南北戰爭之後逐步晉身世界強國地位，並通過「門羅主義」(Monroe Doctrine)政策將拉丁美洲納入勢力範圍；二、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霸權(1945-1970)：以自由世界的霸主自居，通過《布雷頓森林協議》(Bretton Woods Agreement)掌控國際金融和貿易秩序；三、新自由主義霸權(1970-2000)：面對內部資本過度累積和外部競爭，轉向推動經濟和貿易自由化，同時強力操控美元本位的國際金融體系；四、新帝國主義階段(2000-)：以更赤裸裸的外交和軍事介入，直接維護本國資本的全球利益^⑥。

馬克思曾把早期資本主義累積模式，例如殖民地掠奪和圈地

運動，稱為「原始累積」(primitive accumulation)。它一方面將公共資產變成私有財產，從而啟動資本流通和累積的過程；另一方面，它將依附土地的人口驅趕出來，剝奪其原來生計，令他們成為工人階級的儲備軍。哈維在書中則試圖論證，原始累積並非只存在於數百年前，它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，尤其是美國政府主導的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霸權下，同樣俯拾即是，哈維稱之為「掠奪性累積」^⑦。

掠奪性累積涉及一系列廣泛的政治經濟現象，包括農民失地與土地的私有化和商品化；將各類共同、集體和國有資產變成私有財產；迫使不同族群放棄原有生計，轉作受薪工人；攫取發展中地區的天然資源和資產；假借知識產權的名目剽竊傳統知識，等等。哈維指出，此等廣泛現象都有一個共通點：就是必須借助國家對土地、金融、法律或暴力的壟斷，作為赤裸裸地掠奪的政治後盾，令其看起來顯得比較「合理」和「正常」。

四 掠奪性累積與租值攫取

「彈性累積」與「掠奪性累積」這兩個重要概念，分別代表哈維早期和後期著作的核心命題，但他並沒有試圖將它們進行理論上的整合，前後期論著彷彿是各自獨立的體系。如前所述，哈維曾通過「壟斷租值」的概念，分析本土文化被圈定的彈性累積過程，但並沒有試圖將此一概念延伸至後期有關掠奪性累積的討論上。同時，在過往十

「掠奪性累積」涉及一系列廣泛的政治經濟現象。哈維指出此等現象都有一個共通點：就是必須借助國家對土地、金融、法律或暴力的壟斷，作為赤裸裸地掠奪的政治後盾，令其看起來顯得比較「合理」和「正常」。

對哈維而言，資本主義蘊含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：激烈的市場競爭勢必導致新的壟斷出現。在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年代，壟斷資本若通過與國家的緊密結合，就能更有力攫取廣泛區域的壟斷租值。

多年關於掠奪性累積的探討中，哈維亦沒有引入勞動價值生產的視角。凡此種種，皆有必要先進行一些理論補白。

首先，掠奪性累積雖涵蓋極為廣泛的政治經濟現象，但皆指向一個顯而易見的共通點：投入其中的國家或私人資本，均無需參與生產性的活動（如前述製造業的商品生產，以及建造環境的開發建設），只需專注於攫取已經完成生產過程的資產（即「死勞動」，dead labour），或是先天已經存在的天然資源，將它們圈定為私有財產，並且轉化成市場上流通的商品。簡略而言，掠奪性累積乃是一個「不事生產，坐享其成」的過程。

其次，按照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，舉凡一切價值皆是由「活勞動」（living labour）所產生的，因此資本必須通過勞動的增值（valorization of capital），方能轉化為可以賺錢的商品。而剩餘勞動價值的生產、攫取和分配，則構成資本累積的基本規律。然而，掠奪性累積所涵蓋的範疇千差萬別，當中固然直接涉及勞動價值生產的成果（如基建運輸或房地產的私有化），亦即對現成剩餘價值的攫取；但也無可避免地涉及非勞動價值生產的資源（如未經開發土地或天然資源的圈定），又或只是間接涉及勞動價值生產的成果（如受惠於基建運輸的界外效應而增值的周邊土地），二者皆不涉及對剩餘價值的攫取。簡略而言，掠奪性累積所帶來的巨額收益，難免有相當比重並非源於剩餘價值。

再者，由於掠奪性累積無需參與生產性活動，因此資本投入帶來

的巨額回報，更確切地說應被稱為「租值」（rent）而非「盈利」（profit），亦即不必通過對生產要素的積極經營，即可帶來「坐享其成」的可觀回報。「租值」與「壟斷租值」原是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概念，但在哈維的理論框架中卻又存在極大的關聯性。尤其是土地作為主要的生產元素，特定地理位置構成排他性的競爭優勢，地理距離則為市場壟斷提供主要屏障。

隨着投放於次級循環的資本擴大，基建運輸及通訊技術不斷發展，原有地域性的市場壟斷變得容易被打破，外來投資和進口產品重啟市場競爭。但對哈維而言，資本主義蘊含一個重要的內在矛盾：激烈的市場競爭勢必導致新的壟斷出現，斯密（Adam Smith）的「無形之手」轉瞬間又會被壟斷資本的「有形之手」取代。在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年代，壟斷資本若通過與國家的緊密結合，就能更有力攫取廣泛區域的壟斷租值^⑧。

五 全球分工下的價值攫取

毋庸諱言，在「掠奪性累積」的概念框架下，勞動價值生產始終並非哈維的關注重點。在《新帝國主義》一書中，便只有兩頁討論製造業生產的全球分工，以及其對各地工人階級構成的影響^⑨。到了新作《馬克思、資本和經濟理性的瘋狂》，哈維加入了一些相關的補充，以下將作詳細的討論。

在書中第八、九章，哈維指出跨國資本不斷開拓新的累積空間，

相當部分盈利乃來自發展中地區剩餘勞動價值的轉移。但有趣的是，哈維在字裏行間仍然強調，此乃是將土地階層轉化為工人階級——即原始/掠奪性累積的過程。他甚至將這些工人階級的儲備軍，等同於先天存在的天然資源，將兩者同樣歸類為掠奪性累積的搜刮對象（頁154-71）。

相比之下，發達地區工人階級面對激烈的全球競爭，就業的穩定性和滿足感大減，集體議價能力亦被嚴重削弱，因而只能通過「補償性消費」（compensatory consumption）獲取滿足。但這顯然是徒勞無功的過程，因為它只能為廉價進口產品提供出路，並沒有真正為工人階級提供更多的選擇和優質的生活。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急速發展，加上寬鬆的金融信貸環境，皆成了近年推動消費市場增長的主要動力。不只限於生產，在其他經濟環節（如沉重的信用卡債務），同樣可以構成對工人階級的剝削，此乃哈維在掠奪性累積中反覆強調的命題之一（頁172-206）。

無疑，哈維不太願意處理在全球分工下勞動價值生產、攫取和分配的課題。若要進一步了解此問題，我們便只能在書中註釋部分找到「依附理論」（dependency theory）代表人物阿明（Samir Amin）的《關於馬克思價值理論的三篇文章》（*Three Essays on Marx's Theory of Value*）和《世界價值的法則》（*The Law of Worldwide Value*）等參考書目，以及他提出的「帝國主義租值」（imperialist rent）概念（頁222，註25）。阿明指出，在過去一個世紀，

服務行業佔發達地區生產總值的比例從約10%上升至50%，它們大多不屬於馬克思所界定的生產性活動，並不涉及勞動價值生產；主要功能在於：吸收從發展中地區轉移的剩餘勞動價值，並通過國家或市場的再分配，安撫發達地區工人階級的不滿。

阿明相信，隨着發達地區邁進後工業年代，生產性活動的比重不斷下滑，勞動價值生產已無以為繼，只能藉帝國主義租值進行輸血。在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迅速發展的大趨勢下，發達地區的經濟就變得像海市蜃樓；生產總值這類數字遊戲，已漸難反映這些地區的經濟表現。一旦自動化和智能化的生產模式全面普及，連帶全球生產性活動進一步式微，亦將意味着資本主義已經接近終結，資本家反倒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掘墓人。

六 後工業社會的價值攫取

回到哈維的理論框架，只有在工業年代、福特主義的大規模生產模式下，剩餘勞動價值的生產、攫取和分配才是資本累積的最關鍵方式；到了後工業、後福特主義的年代，彈性累積與掠奪性累積模式相繼興起，涉及非勞動價值生產的收益比重漸次提升。在當下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急促發展的新時代，人工智能和機械人迅速普及，對於勞動過程和勞動價值生產將出現何種新的轉變，哈維的新作提供了重要的線索。

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急速發展，加上寬鬆的金融信貸環境，皆成了近年推動消費市場增長的主要動力。不只限於生產，在其他經濟環節，同樣可以構成對工人階級的剝削，此乃哈維在掠奪性累積中反覆強調的命題之一。

隨着發達地區的生產性活動減少，金錢所量度或商品價格所呈現的，只是一大堆「有價無值」的「反價值」。服務行業的非生產性勞動比重上升，相關活動只能促進商品的流通，但在過程中其實並沒有創造勞動價值。

哈維在書中提出的一個關注重點在於：隨着資本主義累積模式的不斷轉化，大量擁有市場價格的資產、商品或服務卻不一定涉及勞動價值的生產；相反，勞動價值亦不一定能取得定價，通過市場流通來實現其價值，形成「有價無值」或「有值無價」的矛盾現象，這亦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面對的其中一個主要矛盾。

在第三、四章，哈維首先回到金錢本質的討論上，因為商品價格必須通過金錢來量度。在累積模式的轉化過程中，貨幣體系也經歷了反覆的演變，但卻不一定能有效反映生產價值。金錢原來只是商品市場的交易中介，但最終卻變成頭等重要的商品，人們可以通過放貸和收息賺取巨額盈利。對於那些已脫離生產性活動、單純依賴金錢賺取收益的金錢資本，哈維稱之為「虛擬資本」(fictitious capital)。尤其是在1970年代美元脫離金本位制度之後，貨幣發行和流通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最主要的累積工具。它不但無法配合生產性活動的需要，甚至已完全脫離商品市場的規律，以至扭曲原來的生產性活動(頁51-71)。

換句話說，儘管商品價格必須以金錢來量度，但貨幣體系卻未必滿足此一功能。資本必須依賴金錢中介來完成累積的過程，例如消費者要有足夠的現金購買商品，商品才能成功出售，生產價值才能體現，資本投入才能取得回報；一旦資本流通的某個環節出現問題，金錢再也無法有效體現生產價值，便會令資本家陷入財政困難，而當經

濟困難普遍出現時，將構成整體經濟的危機。由於貨幣體系的嚴重扭曲，當代資本主義出現經濟危機的頻率遂大大增加(頁72-93)。

哈維由此提出，隨着發達地區的生產性活動減少，金錢所量度或商品價格所呈現的，只是一大堆「有價無值」的「反價值」(anti-value)(頁99-100)。服務行業的非生產性勞動比重上升，相關活動只能促進商品的流通，但在過程中其實並沒有創造勞動價值，不過正如哈維所說：「它們仍是剩餘價值的重要來源。就和機器的功能一樣，服務行業不能生產勞動價值，但卻可以減少勞動價值所佔的比重，從而降低生產成本。因此亦帶來相對增加的剩餘價值，讓資本家能攫取更高的剩餘價值。」(頁87)

七 後就業社會的價值攫取

隨着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發展，知識和技術進一步取代人力投入，自動化和智能化大規模奪走人們的職位。對此哈維同樣直截了當地指出，單憑知識和技術本身，不能生產勞動價值。在第五章，他引用了馬克思在《資本論》中關於二十世紀英國作家希爾頓(James Hilton)和蠶蟲的比喻：

希爾頓寫下《消失的地平線》(*Lost Horizon*)一書，但他只是進行非生產性勞動。就像蠶蟲造絲一樣，兩者都是自然天賦的活動。惟其後以5英鎊的價格賣出產品，他才變成

一名商人。同樣地，一名歌聲像鳥兒般動聽的演唱者，也並沒有進行生產性勞動。直至她和資本家合作售賣音樂，方變成一名受薪工人或商人。(頁98)

《消失的地平線》或某首歌曲被推出市場銷售，進入資本累積的過程，其中資本家賺取的乃是文化商品獨一無二的壟斷租值，可帶來異常豐厚的回報。加上此類產品可無限量地不斷複製，賺錢潛力就更仿似無窮無盡。但哈維卻一再強調，此一過程並不涉及勞動價值的生產，反而進一步突顯了金錢和價值的矛盾，不斷衍生「有價無值」的「反價值」。

對哈維來說，知識和技術同樣類似「蠶蟲造絲」，是人類自然天賦創造的成果。它能普遍應用於生產過程，不斷提升工人的生產力，但同時亦會削弱工人在生產過程的重要性，減少勞動價值所佔的比重。由此在相同的勞動力投入下，產品數量卻得以驚人地大幅增加。當下人工智能和機械人迅速普及，普遍的生產過程皆無需勞動力投入，更令此一落差無上限地不斷擴大，金錢和價值之間的矛盾則被極大化，為資本主義帶來更頻繁和更巨大的過度累積危機^⑩。

在此哈維異常明確地指出，知識和技術被用作提高生產力，以及本土文化被旅遊業拿來賺錢，兩者涉及的資本累積邏輯如出一轍，皆源於自然天賦作為集體象徵資本，原是由整個社群或社區成員所共享，卻被資本圈定作為商品，因而帶來豐厚的壟斷租值。在「大數據」

(big data) 盛行的年代，個人資料(甚至是私隱)更是鋪天蓋地被挪用。版權、專利權、知識產權等愈趨精密的制度設計，則成為圈定和攫取壟斷租值的主要手段(頁102-103)。

八 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未來

知識和技術為資本帶來的，只不過是巨大的壟斷租值而並非盈利，但由於遍及廣泛的經濟領域，因此才令知識和技術的力量看來非常強大，彷彿足以取代人的勞動力。哈維在書中第六章引述馬克思的觀點指出，這只是一種科技的拜物教，令人誤以為科技已經主宰一切。與早期工業社會的機械化過程一樣，工人被進一步去技術化，在勞動過程中被加速邊緣化，猶如機器的附庸。驟眼看來，工人階級再反抗也沒有用，只能乖乖如小綿羊般，順服於至高無上的科技權威(頁109-10)。

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角度出發，生產力的提升衝擊着傳統的生產關係。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既有勞動過程，在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衝擊下，將急速朝向後就業社會的未知方向轉化。但對哈維來說，知識和技術只是啟動變革的催化器，新的社會和經濟秩序能否建立、如何建立，仍視乎其他社會和經濟領域，例如本文提及的貨幣體系、勞動過程和制度設計^⑪，以至未及探討的政治、文化、社會生活和自然生態等廣泛領域，能否

工業社會和後工業社會的既有勞動過程，將急速朝向後就業社會的未知方向轉化。但對哈維來說，知識和技術只是啟動變革的催化器，新的社會和經濟秩序能否建立，仍視乎其他社會和經濟領域以至政治、文化等廣泛領域能否朝向大致協同的方向和步伐轉化。

哈維在書中並未正面觸及的是，與文化和天然資源的攫取一樣，知識和技術資源的開發亦有賴巨大的資本投入。隨着累積模式的不斷演化，資本投放將大有可能從次級循環（建造環境）愈益轉移到三級循環（科學研究）；然而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同樣揮之不去。

朝向大致協同的方向和步伐轉化（頁112-15）。

換句話說，資本在建立駕馭時空的秩序時，必須致力確保不同社會和經濟領域中各項先天或後天的客觀條件，能在特定歷史時空中達至偶合，如此才可構成資本持續累積的基礎。知識和技術固然是促進資本擴張的必要條件，但卻不可能取代其他領域的迥異條件。當下由技術革命啟動的巨大轉變，大可和無產階級發動的政治革命相類比，變革的激進程度實不遑多讓；惟成功與否仍有賴其他社會經濟條件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各方面因素的配合，而且往往缺一不可（頁115-18）。

資訊科技和網絡經濟的衝擊，將會帶來人類新秩序的建立，抑或造成現代工業文明的瓦解？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，哈維終歸對此並無提供明確的答案。畢竟歷史是一個辯證和動態的過程，並沒有命定或預設的發展方向。或許只能視乎人類作為歷史的主體，如何應對這個新時代的嶄新挑戰。

九 結語

看罷哈維的《馬克思、資本和經濟理性的瘋狂》，再仔細思考關於技術革命和勞動價值生產的命題，筆者以為，在當下技術革命的大潮下，人工智能和機械人全面取代人的勞動力，看來已屬無可避免的趨勢。在如此一個既定條件和前提之下，資本主義既有的勞動過程和階級關係，勢必經歷自上而下漸

進瓦解的過程，連帶其他社會經濟領域亦將深受衝擊。知識和技術所帶來的巨大壟斷租值，其流通和分配的模式，將對可見未來的階級關係以至社會秩序，產生具決定性的重要影響^⑫。

與此同時，畢竟我們並非活在希爾頓的年代。哈維在書中並未正面觸及的是，與文化和天然資源的攫取一樣，知識和技術資源的開發亦有賴巨大的資本投入。隨着累積模式的不斷演化，資本投放將大有可能從次級循環（建造環境）愈益轉移到三級循環（科學研究）；然而正如文首所述，資本過度累積的危機同樣揮之不去。在資本主義階級關係已出現根本轉變的前提下，資本累積危機的形成和應對方式又將會產生甚麼變化，亦是另一舉足輕重的重大課題^⑬。

一如哈維過往的所有著作，觀乎這本新作各章節的編排，實較難洞悉其內在邏輯性，因此未必適合從頭到尾順序閱讀。相對於哈維異常清晰的理論框架，本書在編排上的紊亂，總是令人感到極其費解。亦正因如此，讀者往往覺得哈維的著作駁雜繁複，讀來像瞎子摸象一樣，又或如墮五里霧中，難以梳理出一個清晰的頭緒來，甚至可能因而放棄繼續閱讀，殊為可惜。

誠如本文後半部分詳述，讀者大可考慮先看此書第八和九章（後半部），然後再看第三至六章的核心部分，從而對全書內容有概括的掌握。除了以上六章之外，此書第一及二章為資本累積的概論；第七及九章（前半部）為時空修補和建

造環境的概論；由於與哈維其他著作多有重疊，讀者大可按個人需要隨意選讀，在此也就不再贅述了。

註釋

① 詳見鄒崇銘：《流動、掠奪與抗爭：大衛·哈維對資本主義的地理批判》（台北：南方家園，2015）。附於每一章之後的「延伸閱讀」，用意正是提供階級分析的補充。

② David Harvey, *The Urban Experience* (Baltimore, MD: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, 1989).

③ David Harvey, *The Limits to Capital* (Oxford: Blackwell, 1982), 408; *The New Imperialism* (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3), 110.

④ David Harvey, *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: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* (Oxford: Blackwell, 1989).

⑤ David Harvey, "The Art of Rent: Globalization, Monopoly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", *Socialist Register*, vol. 38 (2002): 93-110. 後收入 David Harvey, *Rebel Cities: From the Right to the City to the Urban Revolution* (London: Verso, 2012), 89-114。此文另一版本見於 David Harvey, "The Art of Rent: Globalization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Culture", in *Spaces of Capital: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* (New York: Routledge, 2001), 394-411。

⑥⑦ David Harvey, *The New Imperialism*, 26-86; 137-82.

⑧ 參見前述 "The Art of Rent" 一文，另參見 David Harvey, *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* (London: Profile Books Ltd., 2014), 131-45。

⑨ David Harvey, *The New Imperialism*, 64-65. 哈維此一取態惹來不少嚴苛的批評，包括指摘他以批評「帝國主義」為名，實際上是否定帝國主義的剝削本質。參見 John Smith, "A Critique of David Harvey's Analysis of Imperialism", *Monthly Review*, 26 August 2017, <https://mronline.org/2017/08/26/a-critique-of-david-harveys-analysis-of-imperialism/>; 盧荻：〈「新帝國主義中國」論，請慢用〉（2018年3月2日），《明報》新聞網，https://m.mingpao.com/ins/instantnews/web_tc/article/20180302/s00022/1519906458987。

⑩ 哈維主要回應學術界關於「認知資本主義」(cognitive capitalism)，即科技能取代勞動價值生產的命題。有趣的是，這類論調在中國大陸同樣有市場，參見何祚庥：〈科技使得剩餘價值消失 剝削將不再存在〉（2017年7月3日），新浪財經頭條，<http://cj.sina.com.cn/article/detail/2099880822/306562>。

⑪ 關於技術革命與金融改革的關係，參見 Carlota Perez, *Technological Revolutions and Financial Capital: The Dynamics of Bubbles and Golden Ages* (Cheltenham, England: Edward Edgar, 2002)。

⑫ 關於未來階級關係以至社會秩序的學術討論，至今仍如鳳毛麟角，接觸所及只有 Peter Frase, *Four Futures: Life after Capitalism* (New York: Verso, 2016)。美國著名導演史匹堡 (Steven A. Spielberg) 的電影《一級玩家》(*Ready Player One*, 2018) 亦就相近的課題，進行相對嚴肅的探討。

⑬ 參見鄒崇銘：〈河套科技園的另類擁有模式〉，《明報》，2018年3月27日。